

中西文化冲突中康熙心态析

——从“扬汤之争”到“礼仪之争”兼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萧云岭

(井冈山师范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摘要:康熙亲政的半个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际。康熙对西方文化既有亲和致用心态又存“体”“用”矛盾的心态,当西方文化之“用”危及封建清王朝之“体”时,即行禁止,他对“扬汤之争”和“礼仪之争”的处理反映了他这种复杂变化的心态。中国在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由初始的开放趋向封闭,终未能涵化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中国没有主动地走向近代化,从而落伍于世界近代化潮流。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 康熙 心态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975(2001)04-0027-05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同类型的文化一旦遭遇,就会发生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冲突的过程。文化冲突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层次和内容非常丰富,方式多样。中西文化冲突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春秋战国时期。^{(1)(P32)}本文的时段特定在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天主教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亦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康熙年间,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际。因此,本文以天主教传教士东来为中心考察中西文化冲突中统治阶层的最高代表康熙的心态及中国近代化问题。

一、亲和、致用心态

明末以天主教东传为主要方式的西学东渐在清初基本得以赓续。清入关后第一代帝王康熙之父顺治即与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异常亲密,曾以玛法(满语,即可敬的爷爷)相称,以汤为首的传教士们在顺治当政期间,由于他们修改历法取得成绩,受到了极为优厚的待遇,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还被赐予“通玄法师”的称号。康熙年幼时孤寂无伴,宫廷管教甚严,生活枯燥,更何况他八岁丧父,十岁丧母,遭遇人伦不幸,一颗受伤的孤寂幼小心灵得不到抚慰。而“外人”汤若望随和近人,康熙与他交好,产生深厚的忘年交情。这

是康熙对西方文化产生亲和心态的情感基础。

顺治末年,汤若望的宠臣地位逐步动摇。康熙登基之时,年方八岁,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操纵了实权,其中鳌拜更是大权独揽,并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忠实代表。他怂勇封建卫道士钦天监扬光先参劾汤若望。1664年,扬光先上《请诛邪教疏》,说汤若望在其编制的《时宪历》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字,心存颠覆大清朝的阴谋;汤若望等人宣传的天主教违背以孝道为根本的国教,非所宜用,应将汤等人处死。在鳌拜的操纵下,汤若望被迫下狱,扬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1665年4月宣布结案,汤若望被判处极刑。由于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才免一死,但心身俱受摧残,1666年8月15日含冤病死。年纪尚轻手无实权的康熙于此是痛心又无奈。

关于这段公案,康熙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对皇子们也提到过:“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2)(P115)}

扬汤之争,不仅仅是历法问题上的争论,从深层次上讲,是中西文化相互冲突的表现,因为这种冲突是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东来俱来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紧密相连的。天主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亦即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在康熙即位之初已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较为激烈的问题。

题。

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汤案,为汤若望平反昭雪,予以厚葬,为汤建了高大壮观的坟墓,并亲撰祭文,极尽赞誉:“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血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昇象历之司,受赐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可敬享。”^{(2)(P114)}

此后,康熙对西方传教士宠爱有加,直把他们视作“家里人”。尤其是对在宫廷中供职的传教士,所给待遇是相当宽厚的,他们领俸禄,受爵位,物质待遇无异于甚至更优于朝廷大臣。康熙出巡时也常常带上传教士,不离左右。1682年他到东北巡视时,就带南怀仁一同前往。随同其他官员均需自备费用,而南怀仁的费用则全部由康熙负担。在归途中,一次遇到河水水位上涨,不能徒步渡河,恰好只有一条小船,康熙只唤南怀仁一同过河,连他自己的岳父佟国维也不带。当时佟国维对康熙说:“南怀仁住在我的帐篷里,和我同桌吃饭,因此,我也想过河去。”康熙却答道:“你老不要过河,南怀仁安置在我的帐篷里,让他在我那里吃饭。”^{(3)(P79)}无怪乎南怀仁自己也感叹:“皇帝对我表示异乎寻常的好感,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般,盼我不离开他的身边。”^{(3)(P75)}

康熙出巡时,还常召见散居地方上的西方传教士,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非同寻常的亲近。1684年12月6日(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康熙南巡至南京,传旨召见传教士毕嘉和汪汝望,并收下他们所送的礼物,同时赐给他们青紵白金。康熙与之屈膝交谈,询问他们的姓名年岁,何时来中国,居住南京多久,如何维持生计等等,可谓无微不至。12月9日康熙启程离开南京,“毕嘉、汪汝望于天主堂前设案跪送,手捧黄袱,内函谢恩诗进呈。上驻蹕堂门,谕令接收,启袱赏览,天颜喜悦,良久始启行。”^{(4)(P87-88)}

如果说此举还有些“见外”的话,那么对于马国贤等传教士的态度就完全是视如“家人”了。有一次马国贤等传教士进宫,见到康熙躺在床上,康熙说:“你们虽是外国人,但你们却看到我躺在床上”,“我把你们当作家里人,是非常亲近的。”^{(5)(P13-15)}

康熙对西方文化的亲和心态及随后产生的致
万方数据

用心态还表现在他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赞赏和勤奋学习上。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人算之法,累辑成书,分条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2)(P115)}康熙发愤学习西方历法之始或许只是出于“断人是非”,那么,其后他广泛涉猎西方医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哲学、音乐、测量、制炮术等方面的知识,恐怕就难说其目的是“断人是非”了,他于西方科学文化实有一种亲和心态和致用心态。

1690年5月3日,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写道,康熙在学习几何学时“每次上课,他几乎没有一回不称赞欧洲科学的”。康熙在向宫廷贵戚宗室成员讲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时,常“转而对欧洲科学和向他施教的传教士赞不绝口”^{(6)(P162)}。法国传教士白晋也曾写道:康熙皇帝常让传教士到宫廷内向他及诸皇子讲授西方文化知识,有时自己与传教士在一起学习讨论。有一段时间“皇上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达一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房间里只有两三个宦官陪侍。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7)(P43)}。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身患疟疾,多方医治不见成效,此时,传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他的病。此后不久,传教士罗德先、安泰又治愈了他的心悸和唇瘤。于是康熙大加赞赏,又是赐地建教堂,又是御题匾额对联,极力推介金鸡纳霜,将此药赐给王公大臣,同时他自己还努力学习西医。白晋、巴多明等传教士就向康熙进讲过人体解剖学。

康熙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勤于思考,学有所得。他曾说:“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出,盖地之圆可知也。”^{(8)(P160)}1710年4月2日(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四),钦天监奏报北京及各省月食分数,称四川云南两省无月食。康熙说:“朕尝习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讲究。月食三分以上者,例当入奏。此疏言云南四川两省月不食。因地之体圆,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见。若以不见之故,而即书不食,则人不知之矣。”^{(2)(P126)}康熙不但批评了钦天监奏报含糊,还以地圆说分析了云南四川两省不见月食的原因。

二、“体”“用”矛盾心态

明末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开山祖之一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很注意在华传教的策略技巧的。来华之初,在地方上,他以西僧自居,其教堂悬“西来净土”之匾额。到北京后,又以尊儒为旗号,公开攻击佛教,但尊儒只是旗号,从其所著书中可以看出,他格于形势,不得不诠释儒家学说来达到他反对佛教,排斥空疏的宋儒理学的目的。此举实瞒过了徐光启等人。徐称天主教义可以“补儒易佛”;刘斗墟说利玛窦“其言多与孔孟相合,又明辨释氏之不足”;大学士叶向高也以利氏为儒教挚友,赞其“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此后,利氏又传扬西方科学,以赢得朝野主张实学的学者和官员之心。康熙早年研读过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并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能够敬儒守律是很赞同的。

纵观康熙一生,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1705年罗马教皇特使多罗来华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对天主教的想法极类似于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观点,体现在他亲和、致用心态上;在后期,鉴于西方文化之“用”有碍清封建王朝之“体”,对天主教采取了禁行的政策措施。

实际上自天主教进入中国以来,就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视其为邪教,要求禁止。明末南京礼部侍郎沈淮就曾发起过反教会运动——南京教案,清初的扬光先汤若望之案更是震动朝野。康熙亲政未久,针对宫廷中和地方上不少大臣要员视天主教为邪教,主张严禁的形势,他一度谕令禁止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但即便如此,他本人也并不视天主教为邪教异端。1687年5月23日(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康熙说:“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反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9〕}(P1617)

1687年7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李明、白晋、刘应与张诚抵达浙江省宁波府,浙江巡抚金铉拟将他们递解回国。康熙得知消息后,立即传旨:“洪若(翰)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4〕}(P91)康熙对西方传教士和天主教的这种宽容,除了他特有的亲和心态外,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留用态度,即利用传教士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为朝廷服务。

康熙对传教士的留用态度源于他的致用思想。如前所述,康熙自己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其态度之认真、用功之勤奋,在明清帝王中是罕见的。这决不仅仅是为了“断人是非”,他实有学以致用的思想。《东华录》载:“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上御乾清门,取《性理》展阅,谓诸臣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朕观此法必不能合,尽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千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方圆诸图指示诸臣曰:‘所言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则必有奇零,理甚明显。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勾股之法,极其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法即从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八声仍还本音。又曰:‘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10〕}(P259—260)康熙对他的大臣们着重讲解了数学于计算河道闸口昼夜流量的方法。可见他是要学以致用的。

正是如此,1669年,康熙命南怀仁制造天文仪器,南氏于1673年制成纪限仪、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以及天球仪等,配置于观象台上。平定三藩时,康熙又命南怀仁制造西洋火炮,南氏后来还撰写了《神威图说》,详细介绍了造炮技术,并在康熙的支持下于1681年刊印。

康熙最大的致用思想实践活动当属测绘全国地图了。1708年,康熙派传教士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大地测量,编绘地图。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西方传教士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麦大成、潘如、汤尚贤、冯秉正、德玛诺等。1717年,中西测绘人员齐集于京师,康熙传旨由杜德美、雷孝思和白晋同中国官员一道总编绘。次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全国性测量。在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纬长度上下不同,证实了地球为扁圆形。”^{〔11〕}(P184—185)

正因西方文化可资借用,加上康熙的亲和心态和中华洋洋大国心态的驱使,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在康熙本人的授意下,礼部尚书等议奏:“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

劳绩勤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康熙立即同意了这道“议奏”。这样,传教士就可“依旨”在中国自由传教了。这道经皇帝批准了的“议奏”在西方被誉为“1692年宽容教令”,传教士则称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2)(P121)}

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由于中西方礼仪之争的再起和激化很快就过去了。1705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民祀孔祭祖,引起康熙的反感,认为:“此等人今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¹²⁾随后康熙对多罗下了逐客令,交澳门总督看管,1710年5月,多罗死于监禁中。1720年,教皇再遣特使嘉乐来华呈递对中国教民的禁约,康熙愤而禁教:“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¹²⁾

在这里康熙将天主教视为乱言惑众的“异端小教”,其原先的亲心态似乎荡然无存。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似乎骤然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这是康熙个人的兴趣变化使然;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康熙“西学东源”思想使然。恐怕史实并非如此,实是康熙“体”“用”矛盾心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从他对扬光先的处置上可以看出些端倪。

1669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予以厚葬,并亲撰祭文,体现了他对汤的敬爱之情,但是对汤的对立面扬光先,康熙在一片要求治扬氏死罪的呼声中并未定他死罪,而是让他告老还乡。可以这样说,在当时,汤若望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扬光先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扬汤之争实为中西文化冲突的生动具体体现。康熙不治扬光先死罪,恐怕潜意识里也认为扬氏之言多少在理,天主教义隐隐有违以孝道为根本的国教。

1705年的礼仪之争其实质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但是礼仪之争与扬汤之争又有很大区别。扬汤之争西方文化之“用”尚未危及封建清王朝之“体”,因此,康熙的亲、致用心态占了上风。到礼仪之争时,西方文化之“用”已危及封建王

朝之“体”了,康熙这个不能“背叛”的封建帝王其亲和、致用心态只好让位,对天主教他当然要即行禁止,并通过封闭国门来拒挡“异端小教”。

三、结论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国主流文化(儒教文化)中缺乏“个人主义因素”,从而缺乏一种要求人们艰苦奋斗为此生此世建功立业的“新教伦理”激发的精神催生资本主义社会。国内的李伯重先生则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英国模式(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模式)的江南道路——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商品化道路,其推动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但是这条道路因西方的人侵而中断。⁽¹³⁾这些考察研究是颇能给人启示的。可以说,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是他陷入一种精神和文化决定论。李伯重先生的看法新颖别致却近乎结构学派的观点。

康熙年间江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现象,学界已基本认同,这里毋须具论。但是,笔者以为商品经济(近代意义的)的孕育发展必须建立在地市场需求上,没有市场需求就不可能有什么商品经济。康熙自己曾发现、培育和推广过一种连作双季稻——“御稻种”,此稻粒长、色红、味香,但是由于封建的租佃关系以及需求市场狭小,耕种者缺乏积极性而夭折。在中国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其量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当然,我们不能至此而止,追根究底,我们还要回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中人是活跃的因素,人不仅是社会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消费者。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准是生产工具,生产力在社会中的代表一定是人,这个代表同时又是与这种生产力相对应(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如果承认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矛盾的话,这个代表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只有当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阶层出现并初步形成时,社会才可能发生巨大变革——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改良。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可谓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是,他只是代表封建王室去施恩扬威,并不

是代表一个什么新兴阶层去寻求商品市场或生产商品的廉价原材料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他在斯里兰卡的布施碑,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生产关系制度化、法律化、体制化即成为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以康熙为代表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纳西方近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接纳一些先进的生产力,但总是以不破坏封建生产关系为底线的。于此,四库馆臣们也有颇深见解:“欧罗巴人天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往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14]留用传教士是为了致用,即“节取其技能”,驱逐传教士实行禁教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天主教义,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尤其是他们的社会观作为“异端之尤”,具有瓦解封建主义官方哲学的因素。

因此康熙晚年更是封锁海疆,甚至不惜禁止中外贸易往来。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康熙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并没有实现“脱胎换骨”,没有“进化”为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代表。当然,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然落后于西方社会,所以在社会中下层也未能够形成新生产力的代表阶层,进而要求建立与新生产力相对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中国在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由初始的开放趋向封闭,终未能涵化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中国逐步与世隔绝,没有主动走向近代化,融入世界近代化大潮,从而造成了历史悲剧。戴逸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深刻的话: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

则正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长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参 考 文 献:

- [1]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2]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 [3]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4]黄伯禄. 正教奉褒[M]. 上海:光绪三十年甲辰孟秋月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
- [5]刘晓明. 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9)[J]. 《紫禁城》1990(4).
- [6]《清史资料》第六辑[C].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7]白晋. 赵晨译, 康熙皇帝[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8]宋德宜. 康熙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起居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 [10][清]蒋良骥. 东华录卷16[M]. 北京:中华书局.
- [11]潘吉星. 康熙与西洋科学[J]. 自然科学史研究卷3第2期, 北京:1984.
- [12]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C]. (2)、(14).
- [13]李伯重.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J]. 历史研究 2001(1).
-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 卷125, 杂家类存目.

中西文化冲突中康熙心态析——从“扬汤之争”到“礼仪之争”兼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作者: [萧云岭](#)
作者单位: [井冈山师范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
刊名: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年, 卷(期): 2001, 22(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4条)

1.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1987
2. [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1993
3.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1985
4. [黄伯禄](#) [正教奉褒](#)
5. [刘晓明](#) [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9\)](#) 1990(04)
6. [《清史资料》第六辑](#) 1985
7. [白晋](#). [赵晨](#) [康熙皇帝](#) 1981
8. [宋德宣](#) [康熙思想研究](#) 1990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起居注](#) 1984
10. [蒋良骐](#) [东华录卷16](#)
11. [潘吉星](#) [康熙与西洋科学](#) 1984(02)
1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13. [李伯重](#)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刊论文\]-历史研究](#) 2001(01)
1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125, 杂家类存目](#)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宾静](#)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研究\(1721—1846\)](#) 2007

清代中期,受“礼仪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自康熙末年,至鸦片战争后,朝廷禁传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开传教成为非法,传教活动陷入困境。这段时期内,外籍传教士先是被逐,后是被杀,传教任务开始逐渐落到本地的天主教徒身上。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地方政府不断地镇压下,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及普通教徒承担了大部分的传教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在私下坚持传播天主教。

本文主要对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展开研究,尝试从华籍天主教徒在传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入手,分析探讨此段时期内华籍天主教徒的身份构成、分布地区,说明他们对这段时期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贡献。论述主要以华籍天主教徒在教内是否担任传教专职,即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两大部分来分别对其开展的活动进行讨论,同时,鉴于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一般民众有所区别,将政治、经济地位、身份较高的奉教皇亲官员(如苏努家族)与普通教徒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通过说明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传教方式,以及奉教皇亲官员和一般教徒的传教方式、特点等,阐述此段时期内华人主体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较前期更大的作用,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并分析在这一中西文化冲突中,华人在接受天主教教义时的特点,以及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gssfxyxb200104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5c8be20-c011-4b26-9b4d-9e4d00900a1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